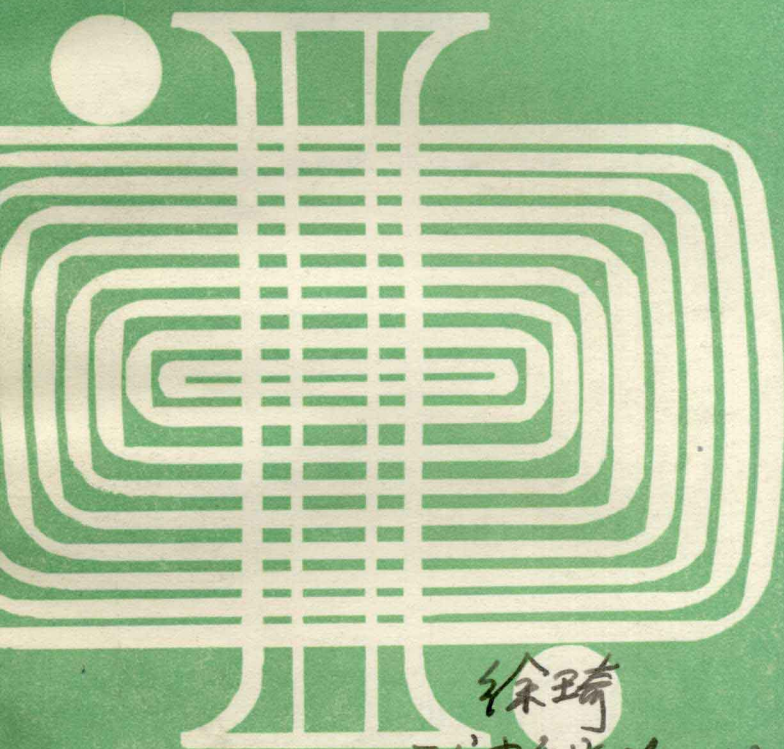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党的基本路线 学习纲要



徐琦

辽宁省党校教材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党的基本路线 学 习 纲 要

张宝荣 张雅坤 谭丽萍 主编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

1993.1

徐琦

(辽)新登第字8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党的
基本路线学习纲要

张宝荣 张雅坤 谭丽萍 主编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发行

(沈阳·南湖)

沈阳于洪科技函授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52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000

责任编辑: 木子

责任校对: 哲人

封面设计: 司徒进

ISBN 7-81006-506-8/D·6 定价: 3.70元

目 录

上 篇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一讲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	3
第二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15
第三讲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27
第四讲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41
第五讲	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54
第六讲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65
第七讲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	78
第八讲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	90
第九讲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	104
第十讲	关于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	119
第十一讲	关于祖国的统一.....	133

下 篇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第十二讲	党的政治路线的历史回顾.....	151
第十三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	169
第十四讲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不动摇.....	186
第十五讲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正确处理一个中 心与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	198
第十六讲	全面理解和把握党的基本路线.....	211

上 篇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十四大报告中最重要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正确分析基本国情，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观点。党的十三大归纳了十二个理论观点；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党的十四大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这次概括的特点：一是着重从理论的角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二是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着重反映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实践、新认识；三是反映了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方谈话的新思想；四是阐述了这个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过程。这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也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越来越丰富。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既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也包含了前29年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的经验；既已初步形成了系统，又需要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既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又是邓小平同志的杰出贡献。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我们必须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使全党达到新的统一和团结，引导我们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第 一 讲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并用这一理论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但是，党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早在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开始了。1956年底，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面对这样一个严

峻的全新的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极其宝贵的探索，为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弄清并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与历史发展，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三个历史时期

（一）1956年初至1957年夏反右斗争前，是适时地、成功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

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和最后完成，客观地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及时地提出“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转变已经开始。1957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总结了建国7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不要机械地照搬外国经验，而要从中国是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论十大关系》从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和党的领导等方面，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方针，成为我党全面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个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件。同年9月，党的八大不仅正确阐述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指出，党和全国人民

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样，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当时我国的形势和主要矛盾，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用党的决议肯定和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成为党探索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如何看待肃反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及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系统分析和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方针、方法及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从而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进一步分析和肯定了《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政治决议中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正确方针。

这样，从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到1957年夏反右斗争开始前，这一年多的时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适时地、成功地开始了对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

（二）1957年夏反右斗争扩大化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是全党在不断反复的过程中曲折探索的时期

这个时期时间较长，前后9年多，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道路的探索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进行的，因而这一探索历尽艰辛，充满曲折，出现了几起几落的

周折。一落：57年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这是我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重大失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这是必要的。但是，党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右派势力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导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不仅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而且在理论上严重冲击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估计。1957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与政治上的反右斗争相适应，经济建设上洋冒进和穷过渡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随之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破坏了生产力，违背了经济规律，受到了惩罚。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第一次严重失误，即曲折探索中的一落。一起：1958年秋冬，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的严重失误有所认识，1958年11月和1959年2月两次召开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前后8个多月，党在指导思想开始有些转变，毛泽东明确提出要纠正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潮，并正确地指出党内的主要锋芒还是要反“左”。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人民公社得到较普遍的整顿，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得到暂时的遏止，“大跃进”的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也降了下来，从而使“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风得到初步的控制，形势开始

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一起。二落：庐山会议后期的反右倾和“大跃进”错误的继续。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主旨在于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万言信，主张深刻反省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后，会议气氛急转直下，会议主题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倾，变为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庐山会议后接着召开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毛泽东也错误地认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庐山会议后期的反右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使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严重升级，并且引伸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从而打断了经济建设中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认识、正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这是二落。二起：1960年10月开始，党中央部署整风整社，党继续了从两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成为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高潮的又一次兴起。1961年1月，党中央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全会和全会预备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全会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分别率调查组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分别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

作条例（草案）》（即农业60条）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业调整方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许多极“左”的发展指标和方针政策得到修改和调整。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又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7,000人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自我批评，指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还说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指出中央犯的错误的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他自己。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功夫去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这些看法，表明党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二起。三落：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再入低潮。7,000人大会前后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随着经济形势的有所好转和国内调整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党内和党的领导层中早已存在的分歧又重新严重起来，加上中苏论战严重升级，使党对形势的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发展起来，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又陷入了挫折。1962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全会上多次发表讲话，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判，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看作阶级斗争的反映，看作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在毛泽东的

提议下，十中全会决议明确宣布：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十中全会标志着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的进一步严重发展。接着，全国又普遍开展了“四清”运动、“五反”运动，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不断升级，直到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这是我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三次回落。

这样，从1957年夏反右斗争扩大化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前的9年中，党在几起几落的不断反复中，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曲折的探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三）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0年，是我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停滞和全面倒退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完全推翻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解与方针政策，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而完全否定了十多年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使党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误入歧途，走入了死胡同。

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主要成果

(一)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

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国情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著名论著中，毛泽东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正确地指出：我们要学习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就不得了。他还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要走？这就明确提出端正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问题。1958年“大跃进”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共产党人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大跃进的错误，认识到必须从实际出发。1960年毛泽东指出：必须端正思想路线，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最近几年，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后来，在毛泽东同志的倡议下，党中央把1961年定为全党调查研究年。在1962年1月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毛泽东郑重地指出：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

(二) 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建设现代化国家

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是明确的。早在全国解放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明确指出：党

的工作重点将由农村转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也正确地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今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又从哲学高度深刻阐述了这个问题。因此，可以说，党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主要不在于理论认识上，而在于政治上不够坚定，国际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

关于建设现代化国家，几经反复，我们党绘制了用100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在时间估计上，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认为需要50年时间，同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提出50—75年时间，即用10—15个五年计划实现四个现代化。“大跃进”时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15年超英赶美。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清醒。1961年9月，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这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估计。在发展战略问题上，1963年9月我国制定国民经济发展长远规划时，提出两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三）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

借鉴苏联的教训，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集中探讨和阐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毛泽东正式使用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这一概念。《论十大关系》强调必须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在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关系上，必须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还提出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更多地搞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仅次于工农业比例关系的最重要的关系。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指出，象中国这样幅员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利。60年代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还指出：都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不实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与苏联走过的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同时也初步涉及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从而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四）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民主的安定的政治环境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全面分析和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